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观的演进和路向

金建萍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发展实践蕴涵着发展观的时代演进和深刻变迁。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确立, 到改革开放后以温饱为基础追求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小康观实践, 再到美好生活为指向的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全面小康观, 社会发展观的演进都是基于中国社会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凝结于“人民性”这一重心, 着力于满足人民幸福的共同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引, 坚持以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路向, 将在现实性上助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

关键词: 社会发展; 人的发展; 新中国; 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4-0013-09

DOI:10.16501/j.cnki.50-1019/d.2019.04.002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不仅要科学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 更要厘清 70 年发展实践中蕴涵的发展观的演进。在社会历史领域, 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凝练反映, 也是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演变进程而不断变化的。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 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表达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什么及怎样发展的问题经过理性思考及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系统认识和总的理念。深入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观的理念演进和路向, 对于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基础上, 构筑生态文明之基, 坚持推进以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 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 为满足劳动者对于基本物质生活改善和生存空间提升的普遍要求, 迫切需要国家采取积极措施确认和保障人民劳动权。从发展社会学视域看, 发展既是一种事实, 也是一种价值。就其作为一种事实而言, 发展表征的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上升性变化, 如物质产品的丰富、居住条件的改善、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等, 可以用劳动者生存权、发展权的普遍满足程度显示出来。1953 年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不仅强调实现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权, 也注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生活普遍改善的发展权目标, 以及方式方法的有效性, 指明了“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442}。到 1955 年 7 月, 我国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 以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 实现了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强调“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437}。

显然, 以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 首先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是所有制的真正的历史革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研究”(14YB033), 项目负责人: 金建萍。

作者简介: 金建萍(1973—), 女, 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命。公有制能为所有人利用人民所创造的全部财富创造平等和现实的机会,才可能是并且确实是满足人们一切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现实基础,也是人们展开全面的生命活动的现实基础。“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2]233},从而实现人民劳动权的确立,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解决劳动者生存发展的社会供求矛盾。社会主义以其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按劳分配、国家的计划调控以及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等重要特征,把人类对自由发展的追求具体化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的追求,利用所能提供的物质、精神和政治上的条件切实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真正成为其个人劳动力所有权和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主体。

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以“人民”范畴概括了创造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者主体。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1475}针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存在的不同社会阶级的属性,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详实分析,不仅重视人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同时也特别看重人在不同环境下的政治态度,以辩证的逻辑深刻地思考着对立阶级的政治态度转化。新中国诞生之后,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人民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也保证了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人民用民主的方法不断教育和改造自己,并以全新的面貌顺利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有了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此时,“人民性”的坚实信仰,已经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实实在在地化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第一次“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4]53-54}。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基础薄弱、承受内外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以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表明了满足社会主义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是当务之急,也公开宣示了人民的国家是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为人类自觉地安排生产活动开辟了道路,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和人与人关系的革命性转变。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因为在这种社会变革中,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类社会有机体的革故鼎新,既具历史的连续性,又有新的生命、新的特质和新的形态不断涌现。列宁曾经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5]57}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要求,也即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为了使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创造出的对象世界,使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推进人的发展的历史文明进程中,连续颁布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在经济水平并不很高的条件下展示出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作为类的发展与每个人的发展的矛盾在逐步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劳动安全得到了初步保障,也为多数人的能力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由上可见,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不仅浸透着开创性历史活动的艰难,同时也孕育着富含人民劳动权的生存性发展观。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远比预先设想的更为艰难,由于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怎样进行,其发展规律是什么,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因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保障劳动权为本,满足人民生存性发展的探索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留下了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无法比拟的震撼影响,同时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极其宝贵

的经验教训。

2 温饱到富足的小康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序幕,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发展命运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荡与灾难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痛定思痛,反思历史,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认识。“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379}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得失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深刻吸取某些失误的教训中,社会主义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成了首要的亟待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在不断探索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的明确认识,并善于把经验总结升华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目标等不同角度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我国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的正确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定基本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依据。

毫无疑问,时代在发展,问题也在不断变化。马克思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是理论的轮廓,而不是规定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更不是为某个具体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做出的具体规定。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的逻辑和理论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需要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考虑到时代的不同特征,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忽视了甚至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一些游离于人的发展需要之外的抽象理论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一味地以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其教训在于没有真正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没有顺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发展特征,从而导致了发展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严重脱离。邓小平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7]126-127}这实际上是敏锐地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新的时代主题,在这一新论断的重要基础上,“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等观点,正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释发展才是解决温饱、走向富足的正确选择。

以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为导向凝结而成的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温饱到富足”的小康观,充分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事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发展主体从整体转换到个人、发展阶段从工业化转换到全面现代化、发展目标转换到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共同富裕上,这些崭新变化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成为确立“温饱到富足”小康观的实践源泉。同时,也恰恰构成了这一发展观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目标等,确保引领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前进,解决共同富裕目标的落实机制、财富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保障等问题,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策略和方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因此,“温饱到富足”的小康观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于: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强调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

“温饱到富足”小康观立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着力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思考社会发展的理论根据,而且也为我们建树了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进一步开

拓了社会发展新思路和新视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于 1984 年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政策,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评价指标指向了人民是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意味着“温饱到富足”小康观旨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基本需求,蕴涵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特别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发展经验,明晰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固然是评价现代化的基础性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的重要认识。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展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已经开始发生从物到人的视角转换,对发展评价指标进行反思。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8]16}。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程度,需要注重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性、协调性,以及重视发展主体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述:“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9]295}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内在统一”观点在当代中国的与时俱进,是对近一百多年来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的发展实践的深刻概括,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统一的新框架。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要实现社会发展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在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进程中,“温饱到富足”小康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3 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观

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观借鉴当代世界的发展理念,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反映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新要求在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新进步。回顾当代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支配下,人类完全将自然界及其他生命体当作自己任意宰割盘剥的对象,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追求推向了极致。经济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更多的劳动产品、劳务数量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其人均数虽然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状况,更不能说明社会财富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病态城市化和人口膨胀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不能真实反映生命价值的真正意义。因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早在 1990 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由成人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三项数值构成的,衡量一国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到 21 世纪时,我国对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强调“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6]689}。

在这一过程中,审视国际形势与总结国外发展经验,理性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与难题,可以清醒地认识到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出现了过去没有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新问题。从微观、局部、短期来看,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有明显的甚至是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但从宏观、全局、长期来看,带来了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等群体享受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多于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和失业者等群体,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就业和工资报酬、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各个领域存在着增长中的不平等不均衡,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10]2},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这是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向我们提供的无可怀疑的经验证明。

基于此,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发展观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现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有机结合,全面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和谐发展。社会发展不仅要从根本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注重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28},把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创新、精神文化的进步、生态系统的平衡等内容作为基础性因素加以吸收,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观,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体现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习近平强调指出:“必须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用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自己,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长征路不懈奋斗。”^{[11]2}面对不断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着眼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小康观旨在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理顺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找准发展着力点,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培育发展新动力,推进全球秩序平等公正、互利共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从国家根本法的层面确认这一重要发展理念,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角度更好地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观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主体,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全面小康观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进一步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涵,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3]1162}的确,全面小康观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把人民放在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贯穿其中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全面小康观价值取向的试金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品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国外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辩证性、总体性、实践性、批判性、交往性等多种表述,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品格存在最大的盲区。以美好生活为指向的全面小康观“站在人民立场把握和处理与人民相关的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7]78},始终体现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人民是发展的主体,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213},实现最广泛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正因为如此,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治、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指标体系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将“使生活在小康社会中的人们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健康平稳、政治民主清明、文化既坚持多样性又有统一向上的价值观、民生水平不断改善均衡、生活环境美丽宜居”^[13];将意味着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不仅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富裕的,而且政治生活中能够充分享有民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14]30}。

4 生态文明为统领的一致性发展路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基础上,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我们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坚持生态文明为统领的一致性发展具有特

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是一场“发展观的革命”,更是一种观察分析人与社会关系的方法。这种革新和方法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超越了简单的生态环境领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15]。

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把生态环境与民生紧密联系起来,集中体现我国人民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的美丽中国新梦想,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15]。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基于人的劳动而展开的互为前提、互为目的又相对独立的同一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6]¹⁶⁸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表明,当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的时候,劳动就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在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亦不断地改造自然物的存在形式,在劳动促进自然界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马克思不仅从现实的人出发,把“现实的人”作为全部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回答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的可能性问题,而且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一致的美好价值理想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人类活动之中,把对人的考察视野主要集中到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与未来命运的关注上。

尽管时至今日,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未进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的理想境界,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趋势和发展进程,一再被现实经验和最新的实践所证实。切实针对当下中国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不仅仅要依靠科学技术,而且首先要求实现观念变革;不能将其停留在“术”的层面,而需要将其提高到“道”的高度^[16],明确人和社会的发展一致性,包涵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人本价值、生态文明系统环保、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的有机统一,实现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相统一和最优化^[17]。

因此,确切地说,坚持以生态文明为统领的人和社会的一致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强调解放人和开发人。把“人”从遮蔽状态中突出出来,促进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的实现,这不仅是唯物史观深刻揭示的一条规律,同时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指向人民的生存环境改善、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提高以及物质、精神和生态需求的满足。马克思对人类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探索,揭示了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规律,换言之,“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最求”^[10]⁴。卢卡奇认为:“《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18]⁷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生生不息动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和发展着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是被当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看待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开拓的伟大实践,是在劳动中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社会发展程度的显著提高和人的发展的全面进步。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内涵在于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在本质上或在其内在逻辑上是为进入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境界提供物质前提、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发展观念的准备。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生态问题虽然“在一些历史著作中曾经出现过”,但“更多地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不是作为自主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来发挥的”^[19]¹⁰⁹。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暴露的是人类深刻的道德危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形态的文明意识的觉醒和生成^[16]。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在反思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就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是探讨如何在不阻碍社会发展和不损害人的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承认自然奥秘的无限性和人自身的有限性”^[20]⁴⁶,在充分认识和顺应自然规律中促进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

在由现实走向未来的进步道路上,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切实呼唤。2019 年 4 月,习近平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21]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全球挑战和共同责任,随着生态文明发展观念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并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22]570}。不只优化社会环境,而且升华生态文明建设,每个人将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3]652}。这既是人民群众对优美且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将得到持续回应和全面满足,更是为每个人自由的、创造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可能性和最大的条件空间,以达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个人最全面发展的一种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或话语体系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或范畴,在价值选择的取向和确立上,既意味着对现代西方文明负面价值的超越性批判,又包含了对我国传统社会压抑人性的历史现象的现代性转换,也对技术消费社会淹没个性的客观事实表达了价值正义,显示出鲜明的现实关怀。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是重要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之一,正如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24]。以生态文明为统领,促进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生活深度融合,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地球家园,“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21]。将对人类世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的历史潮流形成提供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甚至会因此促成社会主义生态化时代复兴或社会主义的升级版^{[25]163}。

5 结论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在时间序列中的展开形式,从而也是人在创造性实践基础上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并且不断调整和生成更符合人类本质存在的理想生存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以劳动权为本的生存性发展观探索,到改革开放后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从温饱到富足的小康观实践,再到对指向美好生活的全面小康观的深入认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表述,都是基于中国社会“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现实问题,凝结于“人民性”这一重心,着力解决国家经济提升、社会民生改善、政治民主推进、公平正义维护,以及保障每个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生态文明为统领的一致性发展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高度负责态度,践行着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责任承诺。由此,致力于生态文明为统领的发展路向,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列宁全集:第 3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F.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1]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 [13] 肖贵清,乔惠波.改革开放40年与小康社会建设[J].探索,2018(5):14-22.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5] 孙宝华.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J].红旗文稿,2019(3):25-27.
- [16] 余源培.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的生长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5):17-23.
- [17] 周海生,吴秀荣,刘希刚.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1):58-64.
- [18]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王伟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19]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0] 卢风,等.生态文明新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21] 习近平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园会开幕式[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4-29.
- [22]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阐发的三重视野[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4):63-70.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4] 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
- [25] 张文红.德国左翼党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3.0”最重要的诞生地[J].红旗文稿,2016(16):34-35.

责任编辑:蒋英州

The Evolu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View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JIN Jianpi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contains the evolution and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development view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70 years ago.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iew of labor rights-oriented surviv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to the well-off society practice aimed at the valu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basis of food and clothing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till to the better life of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centered on new development view of sustainable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ing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view i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realistic issue of how will Chinese society develop and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will be achieved, focused on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emphasizes to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icking to the developing orientation dominated b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ll promote both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 in reality.

Key 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new China;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